

“红学”研究在邵阳(二)

易重廉



2008年8月,娄底谢志明先生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《红楼湘娄文化考》(以下简称《文化考》)。2010年3月,还第二次印刷,足见其畅销。

娄底市从邵阳市划出没多久,习惯上,大家都以为它还是邵阳市。邵阳市的“红学”研究很滞后,故谢先生的这部大著,我就一直把它当作邵阳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“红学”专著,心里很骄傲的。

《文化考》全书共23万字,标价32元整。它如此畅销,原因很简单。

《文化考》宣布:流传了近300年的《红楼梦》(即《石头记》),写的完全是“娄底桃林湾谢氏家族与金陵(南京)乌衣巷谢氏之事”。这句话,初听起来,真是太有点吸引人了!

你不信?那就买一部《文化考》来看一看吧。

为了简化头绪,我只把娄底谢氏稍稍说得详细一点。

一、湘乡扶洲有一个谢氏家族,他们是东山(属湘乡)谢氏应德公的支脉。传至第十四代绍芳公珩玉,娶妻易氏。易氏生三子一女,能干贤淑,母仪乡里,人称“珩玉太婆”。可天不作美,珩玉公英年早逝,族中少数不轨之徒,便趁机挤兑易氏。易氏忍无可忍,40岁那一年(1661),乃毅然拖儿带女,行乞至娄底涟源金石镇桃林湾定居。

《文化考》说:“珩玉太婆”即《红楼梦》中贾母的原型。

二、《红楼梦》中,贾母有子侄三人:贾赦、贾政和贾敬。桃林湾易氏太婆也有三子:长子添荫,次子添弦,三子添蒸。

《文化考》说:贾赦、贾政与贾敬的原型便是添荫、添弦与添蒸。

以上说的是珩玉太婆的儿子辈。

三、看《红》书第二回,贾宝玉的原型是添弦公的第二子如辉。查谢氏族谱,谢如辉,字我宝,“宝玉”之名,一字来自父亲“我宝公”的“宝”,另一字则来自爷爷“珩玉公”的“玉”。这根据很有趣,也很实在,不相信不行呀!

接着,《文化考》详辩了《红》书中两个很重要的人物贾琏与其妻王熙凤。结论是“贾琏的原型是添蒸的儿子顺观公”,王熙凤的原

型当然就是顺观公之妻了。顺观公妻姓刘。证据确凿,分析中肯,花了不少气力。文繁,不具引。

以上说的是太婆的孙辈。人数多,不烦举。

以上说的是“人”。

四、据《红》书,贾赦、贾政住“荣国府”,贾敬住“宁国府”。而据《文化考》,康熙17年(1678),太婆长子添荫、次子添弦联手在桃林湾修建了三进九厅大厦一座,占地一万多平方米,非常气魄。不久,三子添蒸回老家扶洲周家湾,又独力修建了一座二进六厅的大厦,也同样气魄。两座大厦,一座在西,一座在东,方位与《红》书中的“宁、荣”二府完全相合。

很明白,《红》书中宁、荣二府的原型,就是谢氏兄弟的两座大厦。而稍前的“乐愷堂”,则为《红》书中的“大观园”的原型。

以上说的是“物”。

五、下面说说吴三桂与娄底谢氏家族的关系。

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,很快占领了江南的大片土地,后来竟称帝于湖南的衡阳,改元大周。衡阳与娄底毗邻,太婆之女,色艺俱佳,被这位“爱江山更爱美人”的风流王爷看中,选为爱妃,是理所当然的。

此后,娄底谢氏,深得吴三桂的恩宠,赏赐有加,暴成巨富,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但是,1678年10月,吴三桂病逝,清人乘虚追击,灭了吴三桂。天下形势,一夜遽变。吴三桂成了反贼,迫随吴三桂的成了乱党,与吴三桂关系特殊如谢家的,固不一定个个沦为以泪洗面的罪臣,但诚惶惶恐、朝不保夕的心境,短时间内肯定不会平静下来。《红》书中被抄的贾家与娄底谢氏为吴氏牵连的遭际又何其相似乃尔?

以上说的是“事”。

有了这三个“相合”,《文化考》说:《红楼梦》写的完全是“娄底桃林湾谢氏家族……的事”,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?可以说没有了!

但是,好像还有!《红楼梦》里的“贾氏”怎么会变成娄底桃林湾的谢氏了呢?

谢先生在《文化考》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雄辩的解释:“‘谢’在娄底方言中既读‘谢’(xie),又读成‘夏’,而‘夏’与‘贾’谐音……由此看来,贾姓实际上指的便是谢姓。”

先秦时代,齐国的陈田二氏就相通,因为二字的发音是舌上与舌尖的关系,学者认同,故文献上实例累累。“谢”读为“夏”,“夏”与“贾”相谐,故“谢”可读为“贾”,“谢”读为“贾”,理由没有陈田充分。但作小说,假语村言连篇,稍有不合,亦无可。故我基本同意《文化考》的结论。

这样一来,《红楼梦》与娄底谢氏便是脱不了关系的了,难怪《文化考·序》的作者孙伟科先生要说:“谢先生的努力,使《红楼梦》与湖南,与娄底发生了关系……至少在这点上,谢先生的努力是值得尊重的。”

的确,值得尊重!

下面,我却要对《文化考》一书说一点未

必正确的看法了。

我认为,《文化考》走的是典型的“红学”研究中的“索隐派”路数。这一派的先行者是著名红学家,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。他著有《石头记索隐》,在批评太平闲人的红学研究时,指出他有“种种可笑之附会……而于阐证本事一方面,遂不免未达一间矣”。

看来蔡先生不欣赏一人一物一事的“附会”,而提倡对小说“本事”的研究。

《红楼梦》的“本事”是什么样的呢?

蔡先生说:“《石头记》者,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。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。书中本事,在吊明之亡,揭清之失,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,寓痛惜之意。”

从大处来看如此。

蔡先生又说:林黛玉影朱竹垞,绛珠影其氏也,居潇湘馆,其竹垞之号也。竹垞爱书,刘姥姥入黛玉室,说“竟比那上等书房还好”。薛宝钗影高江村(即高士奇——引者)也。

从小处看又如此。

“索隐派”的研究,一般是先找出一个可以附会的故事或人物来,如什么顺治与董小宛的故事之类,然后便尽意附会,直到完全达到自己心中的目的时为止。

“考证派”的大师胡适先生在其《红楼梦考证》中,毫不客气地讥笑“索隐派”的研究方法是“猜谜”的方法,而且猜的还全是“笨谜”。

让我们再联系南京谢氏简单地谈一谈吧。

《文化考》说:谢氏祖宗有几个重要人物的名字里都有一个“石”字:谢安,字安石。谢万,字万石。谢石,字石奴。他们都住在南京,而南京却叫“石头城”,写谢氏故事的《红楼梦》,最初也正叫《石头记》。

于是,《文化考》的作者振振有词地发问说:“《石头记》记的不是谢安……家族的事,又是何事?”谢氏家族与石头之间好像真是存在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玄妙似地……

《文化考》还有很惊人的宣布呢:《石头记》的底稿,原来是娄底谢氏家族的一个叫“谢三曼”的姑娘写出来的!曹雪芹的《石头记》,实际上只是对三曼的手稿反复琢磨、细心演绎而取得的成果。如果我们认同曹雪芹是《石头记》的第一作者。那么,作为底稿起草人的谢三曼,给她一个第二作者的待遇,理应是绝对合理而又合法的,我们多么希望《文化考》这一个“宣布”也能为世人所认同。

可惜,太遗憾了!

《文化考》又非常慎重地宣布了这样一条:谢三曼的《手稿》,在谢先生父辈手里是收藏得很好的,谢先生也亲眼见过。可是,在他撰著《文化考》,亟需检查这份《手稿》的时候,手稿却被老鼠咬得一塌糊涂,“片纸无存”了。

天呀!从今往后,曹雪芹的《石头记》与谢三曼的《手稿》之间的关系,永远就只能是一个查无实据,又死无对证的“大哑谜”了!“索隐派”的“谜”,再笨也可以瞎猜。“哑谜”也者,它却是只能让人闭紧嘴巴,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的呀!

●暇观亭书话

低调的高度

邓跃东



喝足了酒吃饱了饭,拍拍肚子喝茶聊天,免不了要说说低调,热闹的地方咱不去了,咱有涵养呢。这是当下的流行心态,不摆点绅士淑女的雅静,好像就俗气了,实质上是怕被人看低。

这种气候里,我突然读到了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散文丛书、天山大使周涛的新著《低调》(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)。何以突然?他不是第一次出书了,我对他阅读已久。我们过去在一个军区,我也侍弄文字,先新闻后散文。我清楚“低调”这个词,怎么都不会安放到周涛身上,何况还是书名,立杆为旗啊!

周涛是“狂侠”,他一手拿着诗歌的匕首,一手举着散文的长矛,每投即中,穿透力极强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名字,我多次向写作有年的文友推荐周涛,他们摇头不知或不甚了解。原因不是别的,正是他的“狂”掩盖了名——

我天下无敌,我唯一的敌人是我自己;文无章法,我就是章法;刀剑不过一人敌,笔却是万人敌;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;人而无文其心必愚,文而无武自志必弱;哪儿好玩哪儿去,诗歌可不是给你们用来逗乐朗诵的;亲爱的诗歌离我越来越远了,我不再写诗;散文死气沉沉,我要解放散文;说我狂,我狂得还不够,我哪里配得上如此高贵的褒奖……

周涛就是这样,“狂言”不断,行事无羁。1998年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,他没去北京领奖,说奖金还不够路费,能报销也不给公家添负担。人家希望他去大军区、上海和北京发展,他却不去,仍然留在边地新疆。他的文章写得放纵,集于《稀世之鸟》《游牧长城》《兀立荒原》《天似穹庐》《山河判断》《英雄泪》《天地一文人》,一本比一本恣肆。贾平凹去新疆给他题了“狂涛”二字,他兴奋不已。

周涛四十多岁以六篇雄文定天山,捧得各类大奖,后进阶军级。此后笔耕不辍,三四年成一书,俏拔长青。也许是太盛了,光芒四射,周涛经常得罪人,文坛对他视而不见,正面评论极少。现在,周涛进入七十了,出版《低调》,难道“狂形”消失了,几十年虎啸龙吟方得此道?还是看他在这一本新书里说了些什么吧!

他承认了自己是文人。文人酸腐,软弱无能;文人骚客,风流成性,要挖苦文人,总是花样不穷。现在周涛坦承了,《“文人”的帽子是带上了》,为什么社会总爱揶揄文人呢,因为文人有追求,对没有追求的人形成了挑衅,所以他们要送“帽子”表达不平。

他承认了自己无官能。周涛是将门之后,上升的机会有很多,但他有清醒的认识,认为自己不适合当官,任性偏激、自由散漫、内心脆弱,甚至还怕死,不是带兵的料,一心做个散漫的文人。

他承认了自己的争与不争。周涛此生的风流,莫过于以一己之力对阵着所谓的文坛“话语中心”,用铿锵作品践行了自己的铮铮号音,他单枪匹马突出重围,使抬杠的人把话都噎在了喉咙里。中国作协党组原副书记王巨才对周涛说:你的东西我拜读过,中国当代拿到世界上不给民族丢脸的作家三四人,你是一个;中国作家里面知道你写得好的不在少数,但他们宁愿烂死在肚子里,也不愿说出来。反抗多年后,周涛在《不与

人争一时长短,应与

人争一世高低》里说:有不争,也有争,争前者易生文人相轻之狭隘,不

争后者是枉自为文,没志气,没出息。

他坦承了自己很多的过失和欠缺,他坦承了违背内心去做事是危险的……进入晚境,他觉得下辈子适合当牛仔,干点体力活;他认为最美丽的风景是乌鲁木齐的《初雪》,他在《明月文》里寄托了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,他认为《人对不起驴》……

平实之言,从容之心,成就了一册《低调》。书写的可贵,是周涛把生命中的难言之隐,顾虑忌讳、不足与遗憾、尴尬与从容等等和盘托出了。这是智者的大彻大悟,是对青年之路的理性回望,是对年轻一代的深情寄望。

这是周涛啊,周涛承认这些还是周涛吗?以我二十多年的阅读经历审视,这是周涛,只有周涛才会这样说。如此说低调,是要有大勇气的,要不面子就撕不下来,板斧抡不上去。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度,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呢!

为什么周涛说得出来呢,因为周涛坦诚直率、心无隐晦,他十分真诚。真诚的人敢于说真话,他有不凡的见识和胆识。马克思说,真理如光但它不会谦虚。真话,就不为大众所接受,心里不悦,反说这个人疯狂。你怎知道人家狂妄呢?狂妄难道有标准,我们习惯了用一种眼光看人,超出经验时,就觉得别人不像话。

周涛曾说:乞丐最谦虚,拿个碗整天给人下跪;狂,是不满,是抗争,是进取;我愿意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,只拒绝一样——平庸。如此,一个人的精神高度,决定了他的存在方式,可能与大众不太融合,因为他远远地走在了前面,众人跟不上他的步伐。他是孤独的,很容易被人说成孤傲。

●新书赏析

一本别开生面的建筑彩绘笔记

——评《藏在木头里的灵魂》

王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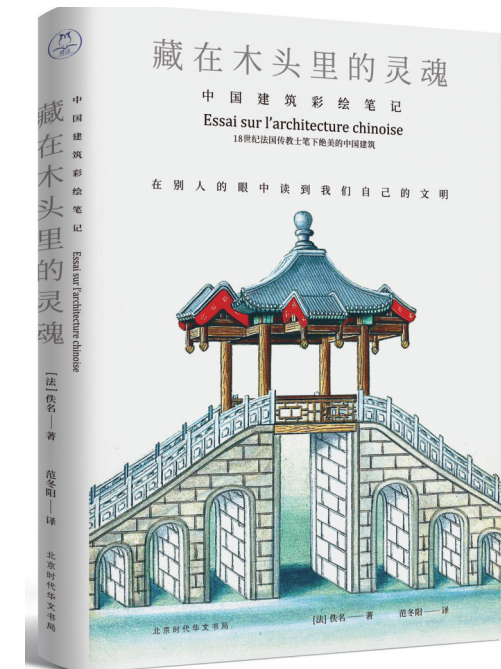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是有名的八级精细木匠,儿时的记忆里充满了锯末刨花的清香,还有那一个个精致的小木模型。于是,连带着喜欢上了传统的建筑,被称为凝固的音乐的它们,无一不是砖木瓦的绝佳搭配。所以,当看到这本《藏在木头里的灵魂:中国建筑彩绘笔记》(法·佚名著,范冬阳译,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)时,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。

这是一本以图画为主的书籍,正如封面上所注:中国建筑彩绘笔记。整本书分为上下册,共包含188幅绘画。上册主要是建筑常用工具、砖瓦墙、照壁、亭子、桥和塔。下册是大型整体建筑结构和住宅内部摆设、台等。这些大量的彩色图画形象地展示出中国建筑的美妙。而且每张图下,都有简明扼要的说明文字。特别是这些图画着色俱都中国画的质感,结构却有着西方画作的透视感,所以特别的写真。原来,这一本描绘介绍中国建筑的画谱手稿,完成于十八世纪,作者是姓名、履历已不可考的法国传教士。

可以看出,这位传教士和你我一样,不是建筑师。也许正因为如此,这本书没有成为枯燥的建筑画册。更加有价值的是,在不多的文字里,包含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信息。你能感觉到作者在试图描述的现象和解释的内容是多角度的,会从照屏的变化中体现官员体质与形制规定,在室内的细节里看出社会地位与交往礼仪的分寸,甚至能猜测出统治阶层的信仰和理想。

十八世纪,富庶广阔的中国是欧洲人想象中的文明世界与神秘古国。路途艰难遥远,难以互通讯息。可这位三百年前的传教士,来到中国,用法国人的思维角度去观察、分析、欣赏中国的一切。然后用图册与文字向他的同胞们介绍这神奇的一切。如今我们还将凭借这本图册,穿越时光,通过这位异族人的独特视角回望曾经的一切,从而体会时间与空间的奇妙变化。

这些年行走过很多地方,看过不少建筑。从典雅的皖南徽派建筑,到规模宏大的福建土楼;从傣家的吊脚楼到泰国的王宫;从雍容的金陵民国建筑到娟秀的大理



白族民居……每每驻足欣赏时,都真实感受到每一种建筑何止是凝固的音乐,它们甚至可以说是记录历史的诗篇,在不停流逝的历史长河之畔,用自己静静伫立的身姿述说着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。只是,很多时候,湮没在岁月中的那些建筑,我们已无法想象了。

所以,这本体会深刻人文情怀与历史感情,体现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《藏在木头里的灵魂》才如此打动人吧。